

独立董事影响审计师选择吗？

——基于董事网络视角的考察^{*}

邢秋航 韩晓梅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10094)

【摘要】独立董事制度赋予独立董事对公司聘用会计师事务所施加影响的权利，然而独董是否在审计师选择中真正发挥作用饱受质疑。本文以2003-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董事网络视角出发，研究处于不同网络位置的独立董事对公司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独立董事网络位置越趋于中心，其任职的公司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进一步研究发现，如果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或公司中存在政治关联，上述关系受到抑制。本文的研究结果提供了独立董事履职情况的支持性证据，并对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独董制度有所启示。

【关键词】独立董事；审计师选择；网络中心度

一、引言

独立董事制度是我国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来，独立董事参与公司决策和监督活动已有近二十年。然而，独董是否切实有效地起到了监督管理层、维护中小股东权益的作用呢？2016年，万科股权之争再次将独立董事制度推上了风口浪尖。中国上市公司协会2009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中明确提出：“独董拥有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议权，及对公司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先认可权”。那么，独立董事是否在公司选聘事务所的过程中切实履行职权，影响了公司的审计师选择呢？声誉和影响力不同的独董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否有差异？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

外部审计可以发挥其外部治理功能以替代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不足（Fan和Wong，2005；Chen等，2011），而公司选择审计师的决策过程对于外界来说一直是一个黑箱。理论上，控股股东（Fang等，2016）、管理层（张敏等，2010）以及独立董事（车宣呈，2007）都会参与审计师聘用的决策过程，但独董在其中是否起作用仍未有定论。我们认为，审计师选择是股东、管理层以及独立董事博弈的结果。其中独立董事拥有提议权和事先认可权且占据董事会三分之一的席位，其在决策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虽然

车宣呈（2007）的研究表明独董比例与聘用国际四大所有显著的相关性，但随着独立董事比例的趋同化，独董比例已无法准确衡量公司中独董的作用，该指标已失去经济意义（Jiang和Kim，2015）。另一方面，独立董事个体之间差异较大，忽略独立董事个体的异质性将会使研究结论偏离实际。因此，独董相关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了独董的类别。

动机和能力对于个人任务有效性同样重要（Campion等，2011）。从动机与能力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独立董事的声誉高低决定其是否关注公司审计师选择，而独立董事影响力大小决定其能否左右公司审计师选择。陈运森（2012）引入的董事网络中心度指标可以较好地同时衡量董事的声誉差异和影响力差异，所以本文使用独董网络中心度指标衡量独董在董事交叉任职所形成的董事网络中的位置，进而检验处于不同网络位置的独立董事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具体地，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14年间的17587个样本数据，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位置越接近中心，其任职的公司越可能选择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且上述关系只存在于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和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中。进一步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对审计师选择的上述影响在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时同样存在。我们还检验了盈余质量对独立董事的影响，从而进一步证实声誉是独立董事治理作用的动力源头。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较高声誉和

^{*} 本文的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740019）的资助。通讯作者：韩晓梅，hanxiaomei@njjust.edu.cn。

影响力的独立董事会采取合理措施规避职业风险,包括敦促公司聘请高质量审计师以加强外部治理。

本文主要的贡献在于:第一,本文提供了独董影响审计师选择的有力证据,进一步丰富了审计师选择的研究文献。以往关于审计师选择的研究较多集中于公司特征的影响,而审计师选择作为一项公司重大决策是由董事会决定的,研究董事会中占三分之一以上席位的独立董事对于该项决策的影响更加合乎情理。第二,本文发现高中心度独立董事可能通过选聘高质量事务所来实现间接治理,是对独立董事治理机制研究的重要拓展,也为独董按照制度要求切实履行职责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第三,本文从市场化程度和政治关联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独董发挥作用的声誉机制,为监管部门进行独董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本文剩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研究设计,第四部分分析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替代性解释和影响机制的探讨,第七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个体之间形成的联结关系的集合构成了社会网络,个体嵌于网络中的位置又将反过来影响其行动的动机与效果(Lin, 2002)。董事作为一种特殊个体,因在同一董事会中任职而相互结识,从而建立联系并构成董事网络。独立董事作为董事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董事网络中的重要成员。

个体的任务有效性是动机与能力的函数,只有当个体同时具备动机和能力时才能把事情做好(Campion等, 2011)。处于董事网络中心位置的独立董事有动机对审计师选择施加影响。由于独董与公司之间没有利益纽带,声誉机制是解释独董作用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Srinivasan(2005)发现声誉受损的独董在劳动力市场上更不受欢迎,唐清泉等(2006)发现具有较高地位和声誉的独董更可能为了规避声誉风险而辞职。从董事网络的视角来看,独立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位置越靠近中心,表明其声望越高,一旦声誉受损其损失也越大。因此,处于网络中心的独立董事更不希望自己任职的公司发生问题,因而会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公司出现重大问题的概率,进而降低其声誉受损的可能性。除了“用脚投票”(即辞去公司独董职位)的消极应对措施,独董还可以通过在董事会中积极发挥作用来影响公司决策,其中一项较为关键的决策就是会计师事务所的聘请。一方面,高质量审计师可以起到外部治理作用,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协助独董监督管理层、制约大股东(杜兴强和谭雪, 2016)。另一方面,聘请高质量审计师也可以给市场传递积极的信息(Kausar等, 2016),反映独董治理的有效性,进一步提升独董的声誉。所以,独立董事在网络中越趋于中心,其维护声誉的动力越强,越倾向于聘请高质量审计师。同时,处于网络中心的独立

董事通常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董事会中更可能左右决议结果,促使董事会聘请高质量审计师。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1:

假设1:独立董事在董事网络中越处于中心位置,公司越可能选择十大会计师事务所。

地区的市场和法律环境越完善,当地人力资本市场越有效(Kaplan和Reishus, 1990),声誉机制对独董的影响也越大。张世鹏等(2013)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会计专业的独董越有动力勤勉履职以维护与提高声誉。随着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增加,处于网络中心的独立董事因公司违规而需承担的声誉受损成本更大,因此更有动力尽责履职。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审计失败的诉讼风险和成本随之降低,因而更容易发生审计意见购买,造成外部审计的治理作用难以发挥(张鸣等, 2012)。也就是说,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外部审计难以成为独董监督管理层的助力,独董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动力下降。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2:

假设2:公司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公司选择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越强。

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不够完善,政治关联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普遍存在。许年行等(2013)指出,当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受到监管处罚时,执法部门的效率较低,换言之,政治关联的公司更容易受到执法部门的庇护。独立董事希望公司选择高质量事务所的原因在于独立董事担心公司由于违规受到处罚会损害自身声誉。如果政治关联公司受到监管处罚的可能性较低,独立董事对于声誉受损的担心理得到缓解,其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积极性也随之下降。据此,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3:当公司中存在政治关联时,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公司选择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将被减弱。

三、研究设计

为研究独董网络中心度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本文参考Guedhami等(2014)、Wang等(2008)、杜兴强和谭雪(2016)、王成方和刘慧龙(2014)等文献构建如下Logit回归模型(1):

$$\begin{aligned} \text{Big10} = & \beta_1 + \beta_2 \text{Score} + \beta_3 \text{Markfan} + \beta_4 \text{Size} + \beta_5 \text{Roa} + \beta_6 \text{Cacl} \\ & + \beta_7 \text{Growth} + \beta_8 \text{Inventory} + \beta_9 \text{Ceo} + \beta_{10} \text{Soe} + \beta_{11} \text{Shrcr1} \\ & + \beta_{12} \text{Rid} + \beta_{13} \text{Lev} + \beta_{14} \text{Agent} + \beta_{15} \text{Issue} \\ & + \beta_{16} \text{Stateowner} + \beta_{17} \text{Trade} + \sum \beta_i \text{Industry}_i \\ & + \sum \beta_j \text{Year}_j + \varepsilon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Big10为审计师选择,我们参考以往关于中国审计师选择的研究(Fang等, 2016; 王成方和刘慧龙, 2014),用是否选择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来衡量。已有许多证据表明大事务所确实能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因为大事务所拥有更高的独立性以及更完备的专业知识(Defond, 1992)。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公布的事务所综

合排名信息，将各年度综合排名前十定义为“十大”事务所，如果公司选择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则 Big10 为 1，否则为 0。Score 为独董网络中心度，Score 越大，说明独董在网络中越处于中心位置。我们参考 Wasserman 和 Faust (1994) 和谢德仁和陈运森 (2012)，用程度中心度 (Degree)、中介中心度 (Betweenness)、接近中心度 (Closeness) 三个指标刻画独立董事在网络中的位置。本文通过以下步骤计算 Score：(1) 通过国泰安的人物特征数据库找到董事的任职数据，获取公司与董事的对应表，即某某公司有哪几位董事，然后导入 stata 中并用 stata2pajek 命令再转换为大型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pajek 可以识别的“公司—董事”的二模网络；(2) 用 pajek 将二模网络处理为“董事—董事”的一模网络，计算所有董事的三个中心度指标；(3) 只保留公司的独立董事中心度数据，以公司为单位，取独董中的最大值作为公司中心度指标，同时采用平均值和中位数进行稳健性检验；(4) 考虑到三个指标分别反应了董事中心度程度的不同侧面，为了全方面衡量中心度，消除每个中心度指标量纲上的差别以及异常值的影响 (Larcker 和 Tayan, 2010; 谢德仁和陈运森, 2012)，我们将三个网络中心度指标分年度排序并分成十组，赋值 1—10；然后加总除以 3，最终得到公司每年的中心度指标 Score。同时在稳健性测试中，我们分别加入程度中心度 (Degree)、中介中心度 (Betweenness)、接近中心度 (Closeness) 参与回归 (Renneboog 和 Zhao, 2014)。

控制变量选取公司规模 (Size)、总资产收益率 (Roa)、流动比率 (Cacl)、成长性 (Growth)、存货总资产比 (Inventory)、资产负债率 (Lev) (Broye 和 Weill, 2008) 等财务指标以及董事长是否兼任 CEO (Ceo)、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Shrcr1)、独立董事比例 (Rid) 等公司治理指标 (杜兴强和谭雪, 2016)。此外我们还加入了代理成本 (Agent) (Defond, 1992)、市场化程度 (Markfan)、产权性质 (Soe)、是否发行权益证券 (Issue) (Fang 等, 2016)、流通股比例 (Trade)、国有持股比例 (Stateowner) (王成方和刘慧龙, 2014)。最后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年度和行业的虚拟变量加以控制。行业分类采用证监会 2012 年行业分类标准。

在进一步检验中我们使用了两个分组变量。一个是市场化程度 (Markfan)，采用樊纲等 (2011) 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016)》所提供的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指标，其中 2008 年到 2014 年的数据以《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016)》为准。另一个是政治关联 (Political)，其定义为：如果公司 CEO 或者董事长现在或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者当选人大代表则为 1，否则为 0 (雷光勇等, 2009)。

本文选取了 2003-2014 年度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备选样本，并按照以下程序进行筛选：(1) 剔除了金融业公司；(2) 剔除了数据缺失的样本；(3) 为了避免极端值的

影响，本文对所有的连续控制变量进行了 winsor 缩尾处理 (1%)。按照上述方法我们一共获得了 17587 个公司年观测值。本文的财务数据和董事人物特征数据主要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从上市公司年报、新浪财经和百度网补充。

四、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Big10 的平均数为 0.448，表明不到一半的上市公司选择了十大事务所。Rid 的平均数为 0.365，方差较小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趋同，已无法作为衡量董事会独立性的指标。我们分别根据市场化程度和是否存在政治关联对本进行分组。在两种分组标准下，多个变量均值和中位数的组间差异显著，说明两组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mean	p50	sd	min	max
Big10	17587	0.448	0	0.497	0	1
Score	17587	5.457	5.667	2.814	1	10
Size	17587	21.70	21.57	1.248	18.94	25.52
Roa	17587	0.038	0.035	0.067	-0.259	0.241
Cacl	17587	2.094	1.358	2.445	0.181	16.34
Growth	17587	0.212	0.126	0.557	-0.687	3.943
Inventory	17587	0.169	0.131	0.155	0	0.759
Ceo	17587	0.195	0	0.397	0	1
Soe	17587	0.498	0	0.500	0	1
Shrcr1	17587	0.366	0.345	0.155	0.0923	0.750
Rid	17587	0.365	0.333	0.0516	0.250	0.571
Lev	17587	0.517	0.512	0.256	0.0519	1.425
Agent	17587	0.109	0.076	0.138	0.008	1.080
Issue	17587	0.120	0	0.324	0	1
Markfan	17587	0.132	0	0.212	0	0.731
Stateowner	17587	0.448	0	0.497	0	1
Trade	17587	0.679	0.661	0.266	0.194	1

(二) 独立董事网络位置与审计师选择

表 2 报告了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与政治关联对其的调节作用。第 (1) 列为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审计师选择的混合 OLS 回归结果，Score 在 1%的水平上与审计师选择显著正相关，即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公司越可能选择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假设 1 得到验证；第 (2)、(3) 列分别是低市场化程度组和高市场化程度组的回归结果，其中在低市场化程度组中 Score 的系数不显著，而高市场化程度组中 Score 的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程度越强,独立董事中心度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越大,即市场化程度增强了声誉机制的作用,从而加强了独立董事对审计师选择问题的重视,假设2得到验证。第(4)、(5)列分别是以有无政治关联为标准分组的回归结果。在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样本组中,Score的系数不显著,而在无政治关联公司样本组中,Score的系数仍然正向显著,说明政治关联影响了独立董事对审计师聘用决策的作用,假设3得到验证。控制变量方面,市场化程度、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等指标与公司选择十大事务所显著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立董事比例与审计师选择不相关,说明独立董事比例已无法较好地衡量董事会独立性。最后,为了确保分组回归时组间系数比较的结果更为稳健,参考Cleary(1999)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来检验组间系数差异。经验p值表明两种分组之间的组间系数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充分验证了假设2和假设3。

表2 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审计师选择

	(1)	(2)	(3)	(4)	(5)
	主回归	低市场化程度	高市场化程度	有政治关联	无政治关联
Score	0.038*** (3.76)	-0.005 (-0.36)	0.082*** (5.93)	0.020 (1.21)	0.048*** (3.81)
Markfan	0.114*** (5.03)	-0.122*** (-2.91)	0.091* (1.67)	0.151*** (3.94)	0.102*** (3.90)
Size	0.280*** (7.76)	0.315*** (6.69)	0.266*** (5.29)	0.307*** (5.22)	0.277*** (6.65)
Roa	0.458 (0.99)	0.273 (0.46)	0.852 (1.25)	0.263 (0.31)	0.495 (0.94)
Cacl	0.006 (0.44)	0.031 (1.51)	-0.021 (-1.13)	-0.033 (-1.55)	0.027 (1.51)
Growth	-0.075** (-2.22)	-0.089* (-1.91)	-0.085* (-1.66)	-0.021 (-0.36)	-0.095** (-2.30)
Inventory	-0.457 (-1.63)	-0.401 (-1.09)	-0.393 (-1.00)	0.314 (0.70)	-0.895*** (-2.72)
Ceo	0.101 (1.35)	0.202* (1.94)	-0.013 (-0.13)	0.115 (0.92)	0.094 (1.02)
Soe	0.040 (0.46)	0.254*** (2.22)	-0.233* (-1.87)	-0.064 (-0.45)	0.106 (1.04)
Shrer1	0.528** (2.13)	0.350 (1.05)	0.694** (2.00)	0.204 (0.51)	0.680** (2.29)
Rid	-0.298 (-0.51)	0.663 (0.84)	-1.454* (-1.88)	0.131 (0.15)	-0.547 (-0.77)

续表

	(1)	(2)	(3)	(4)	(5)
	主回归	低市场化程度	高市场化程度	有政治关联	无政治关联
Lev	-0.286* (-1.71)	-0.092 (-0.42)	-0.531** (-2.15)	-0.451 (-1.53)	-0.180 (-0.94)
Agent	0.242 (1.07)	-0.033 (-0.12)	0.596* (1.73)	1.212** (2.50)	0.031 (0.12)
Issue	0.058 (1.14)	0.119* (1.71)	-0.002 (-0.03)	-0.056 (-0.65)	0.120* (1.92)
Stateowner	0.069 (0.35)	-0.241 (-0.90)	0.491* (1.78)	-0.374 (-1.05)	0.181 (0.78)
Trade	-0.106 (-0.75)	-0.301 (-1.44)	0.094 (0.50)	-0.257 (-1.14)	-0.033 (-0.19)
Constant	-8.462*** (-10.41)	-8.003*** (-7.66)	-8.069*** (-6.81)	-7.212*** (-5.37)	-8.576*** (-9.12)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7587	8916	8671	5682	11905
Pseudo. R ²	0.114	0.126	0.116	0.064	0.131
经验p值		0.000***		0.030**	

注:(1)表中数据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括号内为经过公司层面cluster修正后的t值,***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5%水平上显著;*表示10%水平上显著。(2)“经验p值”用于检验组间系数差异,通过自体抽样(Boot-strap)1000次得到。

(三) 独立董事网络位置与审计师变更

尽管以上实证结果已表明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公司选择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所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公司也可能是先聘请十大会计师事务所而后聘请高中心度独立董事,这种情况下独立董事并不会在审计师选择过程中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进一步研究了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审计师变更的关系,检验当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时独立董事是否影响公司对审计师的选择。公司更换事务所有两种变化方向:一种是较为积极的变化,即原本为十大事务所,在更换时仍然选择十大事务所,或者原本是非十大事务所,但更换为十大事务所;另一种是较为消极的变化,即原本是十大事务所,却更换为非十大事务所,或原本为非十大事务所,更换时仍旧选择非十大事务所。我们将审计师变更Pchange作为被解释变量,当公司进行积极的事务所变更时,Pchange为1,进行消极的变更时则为0。为了排除事务所异常变更对独立董事作用的影响,我们对样本进一步进行仔细删选。在事务所变更的样本基础上,我们剔除了同一个公司在2003年到2014年间变更事务所达到三次以上的样本,因为此类公司的事务所变更行为异于寻常,可能对

结果造成影响。最终得到的事务所变更样本为 1819 个，所有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与模型 1 保持一致。表 3 列出了主要回归结果。结果表明，高中心度独立董事确实能够影响公司进行积极的审计师变更决策。

表 3 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审计师变更

	Pchange
score	0.049 ^{***} (2.57)
N	1819
Pseudo. R ²	0.117

五、稳健性测试

(一) 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表 4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实验组	控制组	差异	T-stat
匹配前	. 522128556	. 427815242	. 009087782	10.38
匹配后	. 522128556	. 494467861	. 027660695	2.41

(二) 工具变量法

董事会聘用独立董事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既可能是独立董事受聘以后发挥应有的职能从而影响公司决策，也可能是独立董事有选择地受聘于选择了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所以即使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法仍不能完全消除本文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 Chakravarty 和 Rutherford (2017)，尝试采用公司总部所在地民航机场客运吞吐量 (ttl) 作为工具变量，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的 2014 年民航机场吞吐量排名》。其中如果公司所在城市没有机场，ttl 则为 0；如果有两个及以上机场，ttl 取本地所有机场的最高值。理由如下：一般来说越处于网络中心的独董事务越繁忙，于是交通是否方便成为衡量独董参加董事会会议时间成本的一种方式。机场客流吞吐量越大，一定程度上表明该城市的交通越方便，独董参加会议成本越低，独董越愿意受聘于公司。所以公司所处城市交通越方便越可能聘请到高网络中心度的独董。但城市交通方便与否不会与公司审计师选择有直接联系，因此该变量适合作为本研究的工具变量。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两阶段回归结果表，仅说明主要的回归系数。在第一阶段回归中，ttl 的系数为 0.130 (t=8.84, p<0.01)，说明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显著影响公司聘用的独董的中心度程度，ttl 对于 Score 有较强解释力。第二阶段回归中 Score 的系数为 0.632 (z=7.149, p<0.01)，说明在控制了内生性以后，独立董事中心度仍然对公司审计师选择有正向影响。

(三) 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结果基本保持稳定：

高中心度独立董事在样本中可能不是随机分布的，影响公司聘任高中心度独董的许多因素可能同时影响审计师选择，因而存在内生性。参考 Chakravarty 和 Rutherford (2017)，本文将独立董事中心度最高的四分之一的公司定为实验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在剩余的四分之三的样本中为每一对一匹配控制组，确保聘请了高中心度独董和没有聘请此类独董的公司基本特征无显著差异。其中倾向得分基于因变量为 HID (HID 等于 1 则为实验组，反之为 0) 的 probit 模型计算得出，我们对每个 HID 为 1 的样本采用 nearest-neighbor 不放回的匹配方法得到 1 个与之最近的样本作为匹配样本。表 4 为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可以看出实验组和控制组选择十大事务所的概率依然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在控制了高中心度独董对公司基本特征的选择效应差异后，高中心度独董对于公司选择十大事务所仍有显著影响。

(1) 改变被解释变量“审计师选择”的定义方法，分别使用事务所综合排名前八和前十二。(2) 考虑到交叉上市公司在审计师选择问题上可能有异于其他公司，本文删除了交叉上市公司样本再进行回归。(3) 参考之前研究审计师选择的相关文献，本文还尝试加入 Loss (上一年度净利润小于 0)、Agent2 (其他应收款/资产总额)、Accr (应计项目)、Separation (两权分离度)、Cross (交叉上市) (Fang et al., 2016) 等可能影响审计师选择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4) 文中 Score 是 Degree、Closeness、Betweenness 三个变量综合的指标，本文还单独使用三个指标分别对 Big10 进行回归。(5) 按照公司和年度两个维度进行了 cluster 处理调整标准误。(6) 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拥有政治优势，受到监管处罚的风险也较小，因此政治关联对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意义存在差异。基于此，我们仅保留非国有企业，检验政治关联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发现政治关联仍然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六、替代性解释与影响机制的探讨

(一) 替代性解释

外部审计的治理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Fan 和 Wong, 2005; Chen 等, 2011)，高中心度独立董事的治理作用也得到了部分文献的证实 (陈运森, 2012a; 陈运森, 2012b)。那么，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和高质量审计师在公司治理中是怎样交互作用的呢？如果二者存在互补关系，公司有动机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以便独立董事和审计师发挥互补作用，而不一定是独立董事选择了高质量的审计师。如果二者存在替代关系，则理论上还存在相反的可能，

即公司可能会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师，因为高中心度独立董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高质量审计师的作用，从而可以节约聘请高质量审计师可能带来的高成本。

我们检验了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审计师质量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表格略），Big10 显著负向影响盈余质量，即高质量审计师能提高盈余质量，这与已有文献的结论一致。但在加入 Big10 以后，Score 正向影响盈余质量，即高中心度独立董事会导致盈余质量的降低，这与已有文献发现独立董事具有治理作用的结论有所矛盾，如黄海杰等（2016）、陈运森（2012）。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于我们度量的是独立董事的不同方面特征所致。本文的高中心度独立董事既是高声誉独董，也通常是身兼多职的“繁忙独董”；虽然高中心度独董能够在总体上提升治理效果，但在把控盈余质量这样比较细致、专业、耗时的工作上，高中心度独立董事因其繁忙可能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所以他们更愿意通过聘请高质量审计师来降低其履职风险。上述检验结果表明，高中心度独立董事与高质量审计师对于盈余质量的影响不存在替代或者互补的效应。

（二）影响机制：盈余质量与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变动

本文的逻辑推导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高中心度独立董事往往更加注重声誉，较低的盈余质量对于高中心度独立董事的影响大于普通独董，所以高中心度独立董事才更有动力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以提高财报的盈余质量。然而，盈余质量的高低是否会对不同的独董有不同的影响仍有待检验。高中心度独立董事虽然注重声誉，但是同时也可能具有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所以我们采用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衡量审计后财务报告的盈余质量，用独董辞职来反映较差的盈余质量对于独董的影响。具体来说，我们用修正 DD 模型计算绝对操纵应计 AbsDA（McNichols，2002），采用 $\Delta Score$ （i 公司 t+1 年和 t 年的 Score 值之差）来衡量独立董事的反应。 $\Delta Score$ 越小，说明越可能存在高中心度独立董事离职。其中，由于 Score 取的是独董网络中心度的最大值，所以普通独董的辞职并不会对 Score 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将盈余质量（AbsDA）与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变化（ $\Delta Score$ ）进行回归（控制变量与模型（1）保持一致），结果列示于表 5。

表 5 盈余质量与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变化

	$\Delta Score$
AbsDA	-0.362** (-2.09)
N	15139
adj. R ²	0.001

注：括号内为 t 值；*** 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示 5% 水平上显著；* 表示 10% 水平上显著。

如表 5 所示，i 公司 t 年的盈余质量越低， $\Delta Score$ 越小，即其 t+1 年网络中心度越可能下降，说明公司盈余质量较差时可能导致高中心度独立董事离职，也就是说较低的盈余质量会对高中心度独董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高中心度独立董事有动机去选择高质量审计师。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2003—2014 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董事网络的角度考察了独立董事对于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在尽可能控制了内生性的影响之后，我们发现，越处于董事网络中心的独立董事，维护声誉的动力和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引导公司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进一步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和审计师选择的关系受到市场化程度与政治关联的影响。其中较低的市场化程度会削弱声誉机制的作用，政治关联降低独董声誉受损的几率，最终都会抑制独董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启示：首先，我们的研究揭示了独立董事在公司聘用审计师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机理，有助于进一步揭开审计师聘用决策的过程。其次，本文从董事网络角度出发研究独立董事的治理效应，丰富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公司治理层面的运用。其中网络中心度指标能较好反映独立董事的声誉和影响力等多个社会层面特质，为以后公司治理问题中个人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最后，《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虽赋予独董提议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权利，但独董是否切实履行该职权一直没有定论。本文对上述问题给出了一个较好的回答，并希望对我国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独董制度有所启发。

主要参考文献

车宣呈. 2007. 独立审计师选择与公司治理特征研究——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审计研究, 2: 61~68

陈运森. 2012. 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审计研究, 5: 92~100

杜兴强, 谭雪. 2016. 董事会国际化与审计师选择: 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审计研究, 3: 98~104

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 2011. 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省份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度报告. 经济科学出版社

黄海杰, 吕长江, 丁慧. 2016. 独立董事声誉与盈余质量——会计专业独董的视角. 管理世界, 3: 128~143

雷光勇, 李书锋, 王秀娟. 2009. 政治关联、审计师选择与公司价值. 管理世界, 7: 145~155

唐清泉, 罗党论, 王莉. 2006.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辞职行为研究——基于前景理论的分析. 南开管理评论, 1: 74~83

王成方, 刘慧龙. 2014. 国有股权与公司 IPO 中的审计师选择行为及动机. 会计研究, 6: 89~95

谢德仁, 陈运森. 2012. 董事网络: 定义、特征和计

量. 会计研究, 3: 44~51

许年行, 江轩宇, 伊志宏, 袁清波. 2013. 政治关联影响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效率吗? 经济学 (季刊), 2: 373~406

张敏, 李伟, 张胜. 2010. 审计师聘任的实际决策者: 股东还是高管. 审计研究, 6: 86~92

张鸣, 田野, 陈全. 2012. 制度环境、审计供求与审计治理——基于我国证券市场中审计师变更问题的实证分析. 会计研究, 5: 77~85

张世鹏, 张洁瑛, 谢星. 2013. 会计独董、治理环境与审计委员会勤勉度. 审计研究, 3: 67~74

Broye, G., L. Weill. 2008. Does Leverage Influence Auditor Choice?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 18 (9): 715~731

Campion, M. A., A. A. Fink, B. J. Rugeberg, L. Carr, G. M. Phillips, R. B. Odman. 2011. Doing Competencies Well: Best Practices in Competency Modeling. Personnel Psychology, 64 (1): 225~262

Chakravarty, S., L. G. Rutherford. 2017. Do Busy Directors Influence the Cost of Debt? An Examin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Takeover Vulnerability.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43: 429~443

Chen, H., J. Z. Chen, G. J. Lobo, Y. Wang. 2011. Effects of Audit Qualit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Evidence from China.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8 (3): 892~925

Cleary, S. 199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Status. Journal of Finance, 54 (2): 673~692

Defond, M. L. 199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anges in Client Firm Agency Costs and Auditor Switch.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11 (1): 16~31

Fama, E. F., M. C. Jensen. 1983.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 (2): 301~325

Fan, J. P., T. J. Wong. 2005. Do External Auditors

Perfor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in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East Asi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3 (1): 35~72

Fang, J., J. Pittman, Y. Zhang, Y. Zhao. 2016. Auditor Choi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roup-Affiliated Firm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4 (1): 39~82

Guedhami, O., J. A. Pittman, W. Saffar. 2014. Auditor Choice in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2 (1): 107~162

Jiang, F., K. A. Kim. 2015.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A Moder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32 (3): 190~216

Kaplan, S. N., D. Reishus. 1990. Outside Directorship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7 (2): 389~410

Kausar, A., N. Shroff, H. White. 2016. Real Effects of the Audit Choi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62 (1): 157~181

Lin, N. 2002.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Nichols, M. F. 2002. Discussion of the Quality of Accruals and Earnings: The Role of Accrual Estimation Errors. Accounting Review, 77 (s-1): 61~69

Renneboog, L., Y. Zhao. 2014. Director Networks and Takeover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8 (2): 18~234

Srinivasan, S. 2005. Consequence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Failure for Outside Directors: Evidence from Accounting Restatements and Audit Committee Memb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3 (2): 291~334

Wang, Q., T. J. Wong, L. Xia. 2008. State Ownership,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Auditor Choic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6 (1): 112~134

Wasserman, S., K. Faust.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91 (435): 219~220

Do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fluence the Auditor Choi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rectors Network

Xing Qiuhan & Han Xiaomei

Abstract: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system gives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the right to affect companys' employment of the audit firm, but whether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really play a role in the auditor choice is oppugned. Based on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3 to 2014,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network centrality on the company's auditor choi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network centrality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is, the more likely companies are to choose high-quality auditors.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companies located in a district with a high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or in companies without political connect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supportive evidence about the effe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enlighten the regulator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system.

Key Words: Independent Director; Auditor Choice; Network Centrality